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新的维度

——序岳山岳《六书与中国传统文化》

夏锦乾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的新学与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的国粹学术算起，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这其中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海外新儒学与20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等三次大讨论，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特征及其整体评价逐渐趋于一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讲求天人合一，追求人的生命价值、人与人的亲善仁爱以及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等等，已经不需要再作多余的论证，相反倒可以放心大胆地作为立论的出发点。风靡一时的“河东、河西论”和振奋人心的“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口号，可以说都是以中国文化的“人文性”特性来立论的。

那么，“人文性”真的就可以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吗？我认为这须要对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它的源头的文化作过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决定。遗憾的是，这百余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对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一次全面的调查。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从时代的原因说，这百余年来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大举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的救亡成为了民族救亡的一部分。而文化救亡不能采用简单的抵御、排拒的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而是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以其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唯以此，才能重塑它在异质文化面前的形象，确立它的价值地位。这才是真正的救亡理性。“人文性”正是以西方文化的“科学性”为参照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所在。这一发现不仅找回了天朝大国的文化感觉，而且还可以用它来弥补、批判甚至拯救西方科学主义的弊端。当年的梁启超先生从一次大战的欧洲考察回来，“即将悲观的观念完全扫清”，在《游欧心影录》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们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百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们哩。”而他那个用来超拔的武器正是以“孔、老、墨三位大圣”为主体的“图个心物调和”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由这种救亡理性所驱动，百年来这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大文章，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篇命题作文。根子里除救亡之外它无暇甚至不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作一通盘的考察。

从学术自身的原因来说，百年来中国学术受到西方科学实证思潮的影响自无待言，但是由于对科学实证之“证据”的理解存在偏颇，片面强调一切都须“拿出证据来”，从而助长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怀疑论思潮，以致对待像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样的课题，只能放弃对其悠久的历史源头的探索，从而将整体的文化史拦腰砍断。胡适写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部具有范式创设意义的经典著述中，胡适就认为：“以现在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拿不出能被现代科学认可的证据，连《尚书》、《易经》都全

无史料的价值。因此胡适大胆设定：“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对此，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为胡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赞叹道：“这是何等手段！”蔡元培把胡适的这一做法称为“截断众流”，即从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而言，老子、孔子只能算流，而不能是源，但由于证据的缺乏，便只得截断众流，把老子、孔子当作源头来叙说。我们并不是说从老子、孔子说起就一定不对，而是说失去了源的血脉，从而解读出来的老子、孔子能不能、或者说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貌，这是值得怀疑的。连胡适自己都承认：“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然而，胡适、蔡元培所倡导的“截断众流”的研究范式却对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莫大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一大批史著都采用了这种截断“前因”的方法，例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子学时代”开篇，整个中国哲学史就被他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部分。而影响巨大的古史辨派也因此便对“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加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全面的研究就更加困难了。

从上面所说，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把“人文性”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这是一个在对它的源头文化缺乏调查与研究、从而没有整体地掌握对象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论。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包含它的源头文化的维度，而且这不是可有可无、可增可减的一维，从今天的眼光看，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与气质，在它的早期源头处就已经孕育，并对以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有关它的第一手资料的匮乏，使得对它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自从西方19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催生了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来，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对现存原始族群的田野调查，使得对人类文化源头的研究，摆脱了纯粹思辨形态而归于科学实证的领域，由猜想变为了科学。在我们中国，其实正当胡适“截断众流”之时，王国维已经综合大量地下出土的殷商甲骨材料，写下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及《续考》，从而使“卜辞的时代性得以确定，殷代之史实亦得以确定”（郭沫若评语）；往更大的说，这种考证使远古社会、历史、文化面貌日益清晰起来：“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谊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其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同者，必间有获矣。”（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从王国维至今，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考古发现之丰富、考据收获之巨大，都是往昔的研究所难以想象的。所有这些成就，都以不可辩驳的实证证据再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所曾拥有的辉煌。我们相信，所谓中国文化的早熟，指的正是在它的初始阶段就已经达到其他

文化所没有的高度。这一独立存在的文化体，不仅使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论大大落伍，而且也使冯友兰的释古论相形见绌，因为释古论所采用的是以流释源、按流溯源的方法，它比截断众流的方法仅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而已，但在并不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初始阶段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体这一点上，两者却是完全一致的。而今天我们如果认定这一文化源头的独立性，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以后起的子学与经学去解读我们文化的源头，相反还应补上一课，这就是以源释流，即以对中国文化源头的研究成果去解读子学与经学，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作新的审视。

对中国当代学术而言，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意味着我们要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成结论，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的人文性特性的结论为出发点，作新的探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中国学术史”等命题；李泽厚先生提出中国早期的“巫史传统”的命题等等，它们的深刻意义都是启迪我们：悬置一切结论，从“头”解读我们的文化。只有如此，才会更加切近它的原貌；也只有如此，往昔我们以原有的结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单单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是人文性，就很难回答：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却特别长久？皇朝更替的战乱特别频繁与残酷？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第一次真正提出人的解放的问题，并且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整个民族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这些问题如果联系到中国异常发达的初始源头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有人文性特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巫性特性。正是有它的在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疑难疙瘩才会被真正解开。

巫性是巫术文化的集中表现。巫术文化在人类早期普遍存在，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的观点，巫术是“一种真正全民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是人类童年时代所特有的以自我为中心，崇拜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反映。

在巫术世界里，虽然也存在鬼神这种超自然力量，但是它们都臣服于人的力量与意志，听凭人通过仪式来对它们调遣与使唤，这正是巫术不同于宗教的地方。这种对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崇拜，如果说在最初的个人巫术阶段是人类的童心显现，表现着人对世界的巨大的热忱与高度的自信，有着人性最可宝贵的一面，那么发展到后来的公众巫术，它便与部落首领（大、王）的权力相结合，逐步异化为“以人治人”（《中庸》语）的权力意志与功利至上的实用理性。因此，公众巫术决不是巫术的公众化，而是把巫术作为治理公众的工具。部落首领垄断了行施巫术的权利（“绝地通天”），并随时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天与神的意志（天命、帝令），并且通过各种神秘而烦琐的仪式，将它意识形态化，从而变为部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这就形成了早期原始部落的“政—巫”合一的社会结构；部落首领们对巫术性质的改变，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在神与人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代表身份——在神之前是人的代表；在人之前是神的代表。由此，“变”、“易”成为了巫性最基本的观念。可以断言，巫性的一系列重要观念都与史前原始部落首领兼巫师的角色、身份及其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以其权力意志与实用理性为核心内容，以原始的“时”、“位”意识为时空观、以“象”思维为基本的思维方式的一套观念体系。之所以“得意而忘象”。

再例如，探讨并发现了“六书”与传统文化某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其中如关于“传统文化早期许多重要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演进，常与造字思维的递进发展规律表现出同构相应状态及关系”的发现，书中不少章节据此而就传统文化所作的研究和探讨，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传统文化的。书中相应论述了六书与中国远古审美观念的发生、起源及其演进所呈现的阶段性对应关系：“单体象形”阶段，显现为中国远古审美观念孕育积淀准备期；“复体象形”与“会意”阶段，是为远古审美观念发生期；“形声”阶段，体现为自觉按“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期。象形、会意思维与《周易》的形

成、发展的阶段性对应关系：“书卦同源”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且“书”之发生在前，是为本源；《易》之经文是对卦爻象的意解，故“易”与“意”相通，且其主要是运用会意思维的结果；《易传》之《象》主要倾向象形思维，《象》为会意思维等。书中提出的“‘象形’‘会意’造字思维试图克服的‘象’与‘意’矛盾关系，引发并构成为贯穿传统文化认识论发展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的观点，结合运用此观点而对贯穿传统文化发展始终的儒道文化现象，从思维方式角度探讨和论证了儒家多偏重运用象形思维，道家更多体现为会意思维，偏重并非只有，象形会意思维的互补，恰好构成和表现为文化上的儒道互补情形等。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选择了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表现在各章节的论述中，便均有不同程度的新的创获。例如，本书还从原始神话入手，探讨了中国远古神话所表现出来的原始思维特征对造字思维形成和产生的影响；象形思维与早期史官文化、会意思维与先秦诸子散文的关系；造字思维与传统书画艺术所谓“书画同源”以及写实性绘画艺术的“实对”问题，写意性绘画艺术的“传神”、“意境”创造等问题；象形思维与传统戏曲艺术脸谱化，会意思维与戏曲艺术时空关系，会意表演等关系问题。相信读者在研读过程中自会有所体会和感悟的。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本书即使专就一个问题也不可能穷尽，更何况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怎可能尽善尽美。岳山岳先生正是抱着对学术的无限虔诚之心，偏居湘西一隅，穷年累月地徜徉在古文字与文化研究之中，乐而忘返。本书既可以看作他多年探索的心得，也可以认为是他力图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一系列难题的开始，祝愿他在日后的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夏锦乾教授，全国知名学者，《学术月刊》常务副主编。本文是夏先生为贵州湘西电大岳山岳副教授学术专著《“六书”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序》，曾刊载于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第1103期2008年2月14日第6版，《新华文摘》2008年第9期转载）

洞坎人古法造纸仍在流传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虽然如今的造纸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那种古法造纸术依然在民间流传着。永顺县勺哈乡洞坎村是个250多户1000多人的村寨，竹林覆盖面积1100多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古老的造纸技术代代相传，香纸制作经过15道工序，成为了洞坎村的传家之宝。

向余青 摄